

学术论丛

第一辑

北京师范大学
一九七九年十月

学 术 论 丛

第 一 辑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1979.10

目 录

精神解放和文章的变迁·····	郭预衡 (1)
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	钟敬文 (19)
韩愈评价的几个问题·····	郭预衡 (43)
屈原赋的历史意义·····	聂石樵 (60)
《说文解字》的价值和功用·····	陆宗达 (79)
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	启 功 (96)
“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	钟敬文 (117)
五四运动与新旧“红学”·····	吕启祥 (132)

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

和三千六百年·····	白寿彝 (143)
中国史学的童年·····	白寿彝 (152)
汉魏之际封建说·····	何兹全 (164)
治史遗简附晋长沙王义卒年考·····	陈垣遗作 (181)
李自成起事考·····	顾 诚 (188)
李岩质疑·····	顾 诚 (199)
五四运动时期反对封建文化专制的斗争·····	龚书铎 (223)
论李大钊同志由民主主义者向 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张静如 (237)

七十年代西方儿童心理学发展述评……………朱智贤（260）

阶级与客观真理

——驳林彪、“四人帮”的阶级真理论……………齐振海（271）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齐振海（277）

民主概念的历史发展……………于凤梧（287）

CONTENTS

Mental Emancipation and the Changes in Writing	Guo Yuheng (1)
The Myt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aintings on Silk in the Han Tombs in Mawangdui, Hunan Province.....	Zhong Jingwen (19)
Some Questions in the Appraisal of Han Yu	Guo Yuheng (43)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Qu Yuan's Poems	Nie Shiqiao (60)
The Value and Use of the <u>Analytical Dictionary</u> of Chinese Characters.....	Lu Zongda (79)
On the Grammar of Ancient Chinese Poems and Rhythmical Prose.....	Qi Gong (96)
Folk-Song Study Around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of 1919.....	Zhong Jingwen (117)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Old and New Schools in the Study of <u>A Dream of Red Mansions</u>	Lü Qixiang (132)
Periods in China's History : 1.7 Million Years and 3,600 Years.....	Bai Shouyi (143)
Childhood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Bai Shouyi (152)

On the Han-wei Period Being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Feudal Society.....	He Zichuan (164)
Excerpts of Letter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ppendix: Research Notes on the Date of Death of Changsha's Prince Yi of the Jin Dynasty.....	The Late Chen Yuan (181)
Research Notes on Li Zicheng's Uprising.....	Gu Cheng (188)
Some Doubts About the Historical Data on Li Yan	Gu Cheng (199)
Struggle in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gainst Feudal Cultural Autocracy.....	Gong Shuduo (223)
On Comrade Li Dazhao's Change from a Democrat to a Communist.....	Zhang Jingru (237)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in the 70's of Child Psychology in the West.....	Zhu Zhixian (260)
Classes and Objective Truth —Refuting the "Theory of Class Truth" of Lin Biao and the Gang of Four.....	Qi Zhenhai (271)
All Are Equal Before Truth.....	Qi Zhenhai (277)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Democracy	Yu Fengwu (287)

精神解放和文章的变迁

郭 预 衡

“五四”运动以后不久，李大钊同志说过：“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①这话说得何其重要！六十年后的今天，回顾“五四”的基本经验，更感到精神解放是科学发展、文化繁荣的一个关键。别的不说，只说“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就足以证明精神解放对于文章变迁的影响之大。

中国文章的变迁，在历史上不止一次，但象“五四”时期白话代替文言，却是空前的大举。因为，号称古文的文言文，唐宋以来已经成为文章的正宗，发展到明代，已经成为“明道”、“立教”“辅俗化民”的工具。^②再到清代，如桐城姚氏，已经被誉为“举天下之美”也“无以易”的宝贝。^③甚至到了“五四”时期也还有人说：“宇宙古今之至美，无以易吾文者。”^④面对如此“珍贵”的遗产，如果废而不用，而“行用土语为文字”，^⑤那还得了？那时候正是鲁迅所说的“改革一两，反动十斤”的年代，一些文人学者之爱护古文，并不亚于“未庄”人们之爱护辫子。一废古文，有人简直“若丧考妣”。

① 《李大钊选集·精神解放》

② 宋濂：《宋学士全集·文说赠王生黼》

③ 曾国藩：《曾文正公文钞·欧阳生文集序》

④ 王树枏：《故旧文存·自序》

⑤ 林纾：《致蔡元培函》（转引《蔡元培选集》附录）

但尽管如此，白话文还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取代了文言。从“五四”前两三年胡适和陈独秀等提倡白话文，到了“五四”运动之后，为时不久，白话书报便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使得几个桐城后裔，几乎无地自容。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速战速决之局的呢？历代的文章改革运动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况。例如韩愈在唐代提倡古文，也曾不遗余力，而且在他之前，早已有过上百年的酝酿，从隋时李谔上书，到李华、元结诸人引路，已经历时不短；而韩愈以后，又一二百年，到了宋初，古文也并没有占领文苑。虽有柳开立志“肩愈”，石介号召“尊韩”，但当时应举之士竟“未尝有道韩文者。”^①直到欧阳修出来，凭借他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地位，反复提倡，又加上苏氏父子以高才博学，努力写作，韩愈所倡的古文这才取得压倒骈文的优势；历时数百年之久，古文运动才算成功。可以看出，古文代替骈文，曾经很不容易。但白话文之代替古文，竟在数年之内，此中缘故，很值得探讨。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曾说：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

胡适不同意陈独秀讲的“产业发达、人口集中”这个所谓“最后之因”，他说白话文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他引用了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白话文产生的经过，他认为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

胡适强调的是历史原因。在他看来，白话之代文言，乃是历

① 《欧阳文忠公集·记旧本韩文后》

史发展的“自然趋势”，这就是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陈胡二人都是白话文的提倡者，他们的看法值得参考。但我觉得，探讨这个问题，蔡元培在“五四”时期的一些主张尤其重要。蔡元培有一篇答复林纾的信最能说明问题。他当时是北京大学校长，白话文运动的几个先驱人物，都在北京大学。白话文运动能够顺利发展，是和他的办学主张分不开的。他在这封信里说他办大学有“两种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①

以“思想自由”为原则，以“兼容并包”为主义，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悉听其自由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少有的民主气度；对于用人，强调人才难得，反对求全责备，容许“过激之论”，这也是过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民主精神。今天看来，他的“原则”和“主义”，也就有些类似现在所说的“学术民主”。蔡元培于一九三八年写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

① 《蔡元培选集·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

里回顾他从民国六年至十二年（1917—1923）任北京大学校长这段历史时又重复讲到上述的主张，并且说明他到北大就是按这个主张进行整顿工作的。他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始。”“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由此可见，当时“思想自由的风气”之得以“流行”起来，是和蔡元培整顿北大文科分不开的。他在这里还补充说：“我对于各家学说”，“无论何种学派”，“只要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蔡元培的言行是一致的。当时真是说到做到。他说：“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①在蔡元培这样的主张和措施之下，当时的“北大”，简直就成了战国的“稷下”。对于各种学说和学派兼容并包，允许“过激之论”存在，新的文学运动、白话文运动才得以蓬勃发展。

蔡元培的“原则”和“主义”，代表着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精神解放的一个高度。没有这样一个高度的精神解放，就不可能有这样广度的学术民主。

正是由于精神的解放，在白话文运动中就涌现了敢于冲锋陷阵的先驱人物，他们敢于冲破思想的束缚，敢于“扎硬寨，打死战”，^②例如刘半农，当时就是个“活泼、勇敢，很打了几个大仗”的战士。^③这是直到半农逝世，鲁迅还称赞不已的。

关于精神解放的一个重要口号是陈独秀提出的“百家平等，不尚一尊”。^④自从汉武帝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千年

① 《蔡元培选集·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

② 郑振铎：《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

③ 《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④ 《独秀文存·答陈演生书》

来思想界已经形成牢固的精神枷锁。这一口号的提出，乃是一反两千年来的思想束缚，这对于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确实是个极大的震动。林纾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指为“覆孔孟、铲伦常”，并非无缘无故。在这类口号之下，文学革命，伦理革命，政治革命的浪潮便一涌而上了。在深广的革命浪潮的推动之下，钱玄同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说，以及废除汉字、兼废汉语之议，都相继提出来了。^①于是白话文取代古文，相形之下，也就不算“过激”的革命了。

“五四”时期的人物，都是强调精神解放的。李大钊陈独秀之外，鲁迅（即周豫才）和周作人（即周岂明），都曾经非常看重精神界的革命。远在一九〇七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就追求过“精神界之战士”；一九〇八年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及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之失》所说的“心灵桎梏”的“解放”，也是把精神解放看作政治革命的前提。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今天看来，“五四”的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固然得力于精神解放，但这精神解放也正是以政治革命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近百年来的革命运动，没有辛亥革命，没有十月革命，李大钊陈独秀诸人那能有如此大胆的精神解放？

还有，“五四”时期的学术民主，也是同当时的政治局面互相关联的。当林纾致书蔡元培，教他“据中而立”、“以守常为是”之时，安福系的政局正在动摇不定。这个政治局面，正是周作人所谓“王纲解纽的时代”。^②周作人这话本来是讲小品文的兴盛原因的，说得并不准确；但我觉得，这话也不妨借用一下：“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由于“王纲解纽。”当时清朝的统治已经垮台，军阀的政权还不稳

① 见《独秀文存·四答钱玄同附钱致陈书》

② 《看云集·〈冰雪小品选〉序》

固，于是蔡元培才得在北大推行“思想自由”的原则、“兼容并包”的主义，而林纾的反对白话文的言论，也才无所托庇。假使当时的反动统治森严，蔡元培的主张的推行，就未必如此顺利。这只要看几年之后的事实便可证明。同样在北京，同样在北大，当段祺瑞执政一统之时，章士钊的《甲寅》复兴之日，那尊孔复古之风，也就曾经猖獗不可一世。而且北洋军阀势力一大，李大钊不但不能再讲精神解放，连人身自由也被剥夺了。

由此看来，精神解放，从根本上说，不能离开政治。

二

精神解放，不仅是近代史上文章变迁的重要原因，也是两千年来历次文章变迁的一个重要条件。这可以算是一条规律。最早而又最突出的事例就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文章的发达，在两三千年的历史范围内，简直是空前绝后的。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文章，两千年来始终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清人章学诚所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①不是随便说的。诸子百家之文确实做到了百花齐放。不但《老》、《庄》不同于《论》、《孟》，韩非也不同于荀卿，《战国策》和《左氏春秋》也各有特色。体裁不同，风格多样，在几百年间，文章之盛，至于如此，这是历朝历代都不曾有过的情况。

周朝末年的“礼崩乐坏”，换个说法也就是所谓“王纲解纽”。这时候私人可以讲学，处士可以横议，于是便导致了人们思想的活跃，学术的自由。当时的稷下也便成了人材荟萃、自由谈论的地区。诸子百家之文就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之下互相争鸣的。

当时的百家都是平等的，彼此争鸣，不尚一尊。儒家固称尧

① 《文史通义·诗教上》

舜，墨家也称尧舜，但尧舜只是各自依托的偶象，并不代表共同的信仰。不但儒墨两家的思想不同，文章各异；即使同为一家，也还分为几派。所谓“儒分为八，墨离为三”，^①就说明一家之内，也各有门户。思想既不一致，文章也就并不雷同。先秦文章之所以丰富多采，同当时各种学派并存的这个状况很有关系。

“五四”时期陈独秀所标榜的“百家平等、不尚一尊”的主张，在战国时代确实是存在过的。

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学术最活跃、思想最自由、精神最解放的时代。

历史上另一个可以称为精神解放的时代，是汉末魏初。那时正是汉朝“王纲解纽”、曹魏政权尚未稳固，三国方当鼎立之时。这时候出了一个曹操，他也是提倡精神解放的，文章于是又起了新的变化。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对于这个问题有过非常全面的论述，他说：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礼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从鲁迅这些话来看，汉末魏初文章的变化，也是同人们的精神解放有关。所谓“思想通脱”、“废除固执”、“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等等，都是精神解放的表现。

① 《韩非子·显学》

后汉以来，文人学者本来是拘守名教的。选拔人材，要举孝廉，但曹操敢于不顾名教，在那《举贤勿拘品行令》中竟然求那“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以及“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类似这样的政令，还不止下过一次。这对于人们精神的解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用人既然不拘品行，为文也就大可随便。于时邨下文士也就不拘一格，建安文章于是呈现异彩。最可贵的是出现了“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而且这影响还不止一代，从魏到晋，人材辈出，从孔融到嵇康，凡所立论，都是比较大胆的；思想和艺术，都是比较新颖的。如果不是精神得到解放，这样的文章是写不出来的。

历史上还有一次较大的文章变迁，是唐代韩愈所提倡的古文运动。但古文运动和精神解放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知道，韩愈提倡古文，是要宣传古道，亦即所谓“文以载道”的。按照传统的看法，象韩愈这样卫道的人，无论怎么说也很难说他精神解放。不过在我看来，对于韩愈，必须一分为二。至少在古文家中，他的精神还是相当解放的。他的文章虽然没有做到“想说什么便说什么”，但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大胆，也相当随便。虽有卫道之文，也有游戏之作。由于大胆讲话，曾经两次遭贬；由于“以文为戏”，曾经招致裴度、张籍的批评。他虽然标榜道统，其实是兼采儒墨，甚至也不废黄老刑名。韩愈的道和后来宋儒的道是很不相同的。至于同时的柳宗元，更是兼采百家之说，出入儒释二教，思想比韩愈还要活跃。他的文章虽然也要“明道”，其实是写得很随便的。

当然，唐代韩柳的古文，其随便的程度，不能和汉末魏初相比，更不能和春秋战国相比。但不论如何，这次古文运动，仍然是一次文章的改革，甚至也称得上一次革命。蔡元培的《在俄语传习所的演说》中说过：“韩昌黎、柳柳州等提倡古文”，“也算文学上一次革命。”还说是：“与欧洲的文艺中兴一样。”这

个评价是相当高了。还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也说过：当南北朝的骈文已经成为“泥塑美人”之际，“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垛之习，”“俗论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论，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这也肯定了韩柳古文运动的功绩。至于胡适，本来是以古文为死文学的，但他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也同样说“韩柳和当时皆为文学革命之人”，说“韩柳之为韩柳，未可厚非”。这些赞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总之，唐代的古文运动，也还算是一次革命。虽然有些尊孔卫道，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兼容并包。唐代中期虽然王纲并未解纽，但从开国以来，朝廷的风度，和前朝后代相比，究竟还是比较开明，比较能够容纳异端和外来事物。人们的思想也比较解放。也正因此，当时的古文运动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以上所说，是文章发展变迁的一个方面。

但是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历史上凡遇人们的精神受到束缚，文章的发达便受限制。这样的时代一般都在政权已经巩固、学术已定一尊之时，虽不尽然，但大致如此。

例如春秋战国之世，文章曾经盛极一时，但自从秦朝一统天下之后，情况便不同了。我们并不否认“书同文，车同轨”的伟大功绩，但那“燔灭文章，以愚黔首”^①的作法，则不能不说是禁锢思想、阻碍文化发展的专制主义。刘勰《文心雕龙》说“秦世不文，”正是这种专制主义造成的恶果。幸而秦的统治时间不长，这种政治局面没有延续多久。到了楚汉之际，诸子百家便又开始抬头。当时最先活动的是纵横家。纵横本是乱世之学，秦失其鹿，诸侯并逐，或附楚而攻汉，或附汉而攻楚，合谋缔约，都叫“纵横”。这时的一些谋臣象酈食其、蒯通，大概都是纯粹的

① 《汉书·艺文志》

纵横家；就连张良、范增，也都带有六国策士的遗风；下至随何、陈恢、袁生、武涉、田肯、夏说之流，大抵也都是游谈之士。但是，楚汉战争一结束，情况又不同了。尽管汉初诸侯割据，游士尚可存身；朝廷杂霸为治，学者也不专一业。但天下既然一统，学术也就趋向一尊。自从武帝崇儒以来，虽然并不专任儒生；而朝廷取士，则颇有罢黜百家的明令。例如《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冬十月，……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到了元帝年间，法禁更严，据《汉书·东平王传》记载：东平王向朝廷“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便认为：“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都“不可予”。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连先秦诸子和司马迁的著作都要秘藏而不给人看，学术自由就不多了。也就因此，到了东汉，象汉初那样纵横驰骋的文章也就很少见了。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还能够“作谤书流于后世”，^①但到了班固，就因私撰史书、而下狱治罪。现在看来，《汉书》的文章不及《史记》那样生动活泼，也是同作者所处的时代大有关系的。

再往后，汉末魏初，文章虽然又曾一度发达，但是历时也并不久。尽管曹操提倡通脱，邺下文人也称一时之盛，但是曹操的言行是并不一致的。他要用人时，“不仁不孝”都不要紧；但要杀人时，“不仁不孝”便是罪名。他是网罗文学之士的，却以“不孝”之名杀了一个能写文章的孔融，另外还假手别人杀了一个能写文章的祢衡。下至魏晋之际，文人不得好死的更多。这就因为政局一定，文人便不得非圣无法。嵇康之死，阮籍之狂，都是明证。至于往后的空谈老庄，或寄情山水，刘勰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衰系乎时序”，其实都是不谈时事、只谈风月的缘故。齐

① 《后汉书·蔡邕传》

梁以后，文崇骈俪，风花雪月，积案盈箱，此种衰风，追其本源，仍是正始以来世变引起文变的结果。所谓“八代之衰”，是有渊源可寻的。

唐宋两代的古文运动虽有成就，但到了宋代熙宁以后，文网渐密，文章也就大受影响。苏轼在八家之中，是个不羁之才，但自从遭受文祸之后，也就不大敢作文章。看他的《答李端叔书》说：“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云云，戒心实在不小。再到明清以后，党禁和文字狱，伴随着八股取士，更加上宋元理学的影响，思想活跃的文章就更少了。

单以古文而论，唐宋以后，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

明代以后的文章，大致可分两种。其一是那和八股气息相似的卫道的古文，其一就是与八股似乎相反，而实质也多半是少谈时事多谈风月的所谓潇洒超脱的小品。到了清代，连这样的小品也少见，余下的只是道学气更加浓厚的以方苞姚鼎为代表的桐城派的循规蹈矩的文章。“五四”时期所要废除的“古文”，正是这一类。当时攻击的古文家，也并不是唐宋时代的韩、柳、欧、苏，而主要是指明清两代的归、方、刘、姚。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就曾明白地指出：“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都是“妖魔”，而且说“桐城派”乃是“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这一批评虽不免“过激”，但明清以来，几百年间，前后七子以及归、方、刘、姚之文成就不高，则是事实。试看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继编的《续古文辞类纂》，其中所收明清两代之文，真有质量的能数几篇？

思想一经禁锢，精神便带枷锁，好文章也就不能产生了。

当然，这也决不是说，在这几百年间，好文章一篇也不曾有，对桐城派也该一分为二。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时代，同前代相比，则实在有些逊色。